

# Opinion

Observer

上证观察家

中国要实现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必须解决贸易大国与金融小国的矛盾,这需要依托于金融的崛起,而金融崛起则要求拥有国际化的货币环境。目前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各国综合实力此消彼长的较量中,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大于挑战。本次危机也不同程度的创造了人民币成为完全可流通和国际储备货币所需要的基础性条件。

## 牢牢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系列之一

主笔:吴晓求  
执笔:赵锡军 宋晓玲 巨强 晏玲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多种弊端深刻反思,鉴于这种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利己性、缺乏约束制衡机制、权利义务不对称等内在缺陷,各国在不断比较与衡量打破美元惯性的收益和成本,当打破现有货币体系的收益大于成本成为一种持续预期,美元将无法再维持最主国际货币地位,世界贸易呈现出的多元化开放格局,以及世界金融储备体系和世界贸易结算体系的变化趋势,促使全球货币体系必将作根本性调整。

当然,世界经济格局短期内很难因一次危机而彻底改变,短期内美元仍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货币体系在未来一段时期有可能出现欧元和美元争夺主导权、日元和人民币伺机出击的局面。但最终能否出现多强鼎立的局面,仍将取决于博弈各方的力量消长,但从单极到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必然发展趋势。

从单极向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核心要义在于,全面提升欧元、英镑、人民币和日元等货币地位,人民币虽然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但中国拥有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在美国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整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成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一员。

强国决定货币,支撑一国货币地位的是一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大国。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提升到7.7%,保持世界第三位的排名。贸易发展既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迫切需求,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现实力量。金融

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形成负面影响,但就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及中低价产品,收入弹性相对较小,在经济不景气及居民收入下降时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可能不降反升。同时,中国通过采取上调部分行业产品出口退税率,改善对外贸易环境等项措施,部分缓解了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中国进出口影响。因此,金融危机之下的中国对外贸易,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不乏有利因素。此外,危机倒逼中国贸易结构升级,提高产品竞争力和科技含量,这将增强贸易支付的选择权和货币影响力,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

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要求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具有足够大的规模和均衡的结构与此相匹配。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深化,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但与经济和贸易发展比较,发展依然相对滞后,存在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结构冲突。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了“波动溢出效应”。2007年三季度始,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全流通时期配套制度缺失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交错影响下,中国股市持续恐慌性下跌一度使得资本市场再度滑向“次品市场”的边缘。

中国要实现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必须解决贸易大国与金融小国的矛盾,这需要依托于金融的崛起,而金融崛起则要求拥有国际化的货币环境。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下各国综合实力此消彼长的较量中,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大于挑战。

牢牢抓住历史机遇,贸易将是一个突破口。这就要求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结算、投资使用范围。2008年12月12日,中韩达成1800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的协议,人民币首次以官方姿态走出国门。今年1月20日,央行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规模达2000亿元人民币。2月8日,中国与马来西亚签署了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在签署上述三个货币互换协议

前,中国已与俄罗斯、蒙古、缅甸、越南等周边8个国家分别签署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这一系列措施体现了在危机关头中国发挥大国责任,维护地区货币稳定的决心和贡献,也使人民币国际化在举重若轻间迈出了关键一步。此外,还要积极稳妥推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使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整个亚洲率先实现国际化。最后,不仅在周边国家和地区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不仅在实体经济上还要在金融投资上,逐步放松对人民币兑换、交易的限制,最终使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需要一个具有足够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作支撑。发展资本市场,首先要通过持续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法制体系来实现规范发展,以有效解决次品市场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

增强对市场主体和资金的吸引力,实现资本的可持续流动,保持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其次,要完善结构,不仅注重股市,还要注重债市与金融衍生品及市场的发展培育。在产品创新上把握尺度,加强产品设计各环节风险控制和管理;最后,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把中国资本市场培育成国际金融中心主体和世界金融资源配置中心。

一、货币的国际化,将对该国宏观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显著增加。在当前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情况下,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风险更大。我们唯有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配合适度资本管制,以保持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有效控制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

## 保增长会带来调结构么



赵中伟

去年底以来,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当前我国经济继续呈现下滑态势,但在上述政策的作用下,急剧下滑的态势有望得到缓解,与历史经验相一致,细数各经济部门,在经济萧条时期能够并且正在对“保增长”发挥主要作用的依然是投资部门。消费部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持续走低。尤其是,出口萎缩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其对广大农村消费市场的滞后影响正在显现。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前景,居民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走低的态势,最终消费或将出现负增长。

投资部门内部此消彼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相对于国内市场而言,中国的传统制造业产能已经过剩,相当一部分产能依靠外部市场消化,在国际和国内市场同时严重萎缩的情况下,产能过剩的问题愈加突出,企业投资的意愿降低。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回调阶段,房地产企业正在消化库存,房地产投资在持续大幅下滑已成为拖累投资增长的因素。目前,以4万亿投资计划为代表的政府投资,是保增长、扩内需的直接、有效措施,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弥补企业自主投资的下滑。

不过,从各地眼下正争上投资项目的倾向看,我们不能不面对以“调结构”为长期代价换取“保增长”短期收益的隐患。保增长的实质是保就业。短期内,我们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是就业,需要为失业人员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有很大不同。1998年,尚可以启动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同时可以向欧美等国际市场输出过剩产能。当下,房地产市场和国际市场已无从依靠。为了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其“根本着力点”是“扩大国内需求”。虽然报告中指出要“充分发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但是,由于受到社会保障、消费习惯、消费信贷等因素的制约,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难以在短期

内发挥作用。于是,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保持投资较快增长和优化投资结构”,中央政府的投资范围限于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等领域。报告特别强调政府投资“绝不能用于一般加工工业”,但要“支持社会资本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调结构的产业领域既包括汽车、钢铁等十大传统产业,也涵盖新能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报告还指出“特别要减少投资审批、项目核准,落实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但已经露出的苗子是,各地似乎又驾轻就熟地走回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老路。”

在两会期间,各地代表纷纷发表对“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上水平”的看法。多数代表将2009年的本地区GDP增长目标确定在9%以上。将2009年确定为“项目年”也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代表的共识。投资项目所涉及到的产业领域高度重合,汽车、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石化、纺织、电子信息等是各地力保的优势产业,高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被列为各地积极培育的新兴产业。依据过往地方政府在扩张投资方面的积极表现,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应该可以实现。地方政府扩张投资的目的是发展地方经济,但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投资完成后将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本轮“调结构”的结果背离初衷,短期内保就业将导致长期内产能更加过剩,高优化结构越来越远了。

比较而言,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萧条时制定的刺激计划往往优先用于减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领域,其次是投资领域。在投资领域中,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在萧条阶段,消化过剩产能是上述国家制定经济刺激计划过程中信守的一条理念,在总额达7870亿美元的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中,产业投资仅有清洁能源,且数额仅为500亿美元。清洁能源产业被列为美国未来着力发展的新兴主导产业,而不是过剩产能。虽然报告中指出要“充分发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但是,上述国家在制定经济刺激计划时对待投资的做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博士)

## 世界巨变 花旗塌陷

屈红燕

花旗银行3月5日股价曾一度跌破1美元,跌入与垃圾股为伍的“仙股”行列,要是在两年之前,就是最富有想象力的好莱坞导演,也想象不出如此情节,彼时花旗银行的股价为55.12美元,市值高达3000亿美元。本周一,花旗股价经过强劲反弹回升至23美元,但与其最高峰时的表现仍有天壤之别。这是一家全世界最满盛誉的银行,客户囊括全世界最顶尖的公司和最富有的个人,引领着世界银行业的发展方向,1902年就在上海滩设立了分行的老银行,是美国引以为傲的金融服务业皇冠上的明珠。

花旗跌入低价股行列,今昔对比足以令全世界唏嘘。花旗银行代表着在星条旗下“美国模式”取得非凡成就的典型,从“皇冠上的明珠”到跌入低价股行列堪称“花旗之殇”。有学者直言,花旗今天的窘境,一方面世人并不认为花旗的损失已暴露完毕,另一方面,大家还认为银行所依托实体——美国经济本身出了问题。

美国经济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回到了近似于古典自由主义的阶段。古典自由主义崇尚的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体系”,格林斯潘是自由市场体系的信徒,正是在他执政美联储19年时间里,利率一再下降,金融衍生品飞速发展,形成以“先化”美元为单位的市场,从而催生非理性繁荣,随着房价泡沫的破裂引发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贝尔斯登、雷曼兄弟、花旗集团、AIG等著名的国际大公司相继陷入泥潭,整个美国经济及金融体系都摇摇欲坠。

花旗之殇还投射了现代金融理论的缺陷,对利润的无止境渴求已经让美国投资机构不满足于靠基础业务赚辛苦钱,而是在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模型的掩护下,涉足高风险业务,高风险的次级贷款被包卖了无数次,虽然让银行部门不赚利润,却万没有想到为次贷危机

打开了地狱之门。资产定价模型是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基础,虽然它沐浴着诺贝尔奖的光环,数学逻辑漂亮严谨,但是一个庞大的模型涉及无数的假设,任何一个错误的假设都会引起最后定价极大的谬误。正如华尔街日报所反思的那样:“整个智慧大厦在2007年夏天倒塌了,因为我们输入这些模型的数据只包括过去20年过度繁荣时期。”

自由市场体系遭到挑战的同时,中国模式也引起世界关注。就在花旗跌入仙股行列之时,工行中行建行市值却成为全球前三甲,与美国经济遭遇的挑战不同,中国的经济虽然在2008年同样遭遇了一次严寒袭击,但远远不到金融危机前的程度,金融体系依然稳定。实际上中国经济自2000年开始保持了一个长周期的上升轨道,对这样一个封闭多年、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取得这样的发展实属不易,难怪一些经济学家要说“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

中国做对了什么?西方学者的解读提供了另一个独特视角。《北京共识》的作者雷默教授将中国的发展归结为: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其准则。“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冷眼旁观拉美、非洲和亚洲的政治发展,认为自由市场体系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缺乏信用文化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一个“务实管用”的政府,分析家们都注意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政府对市场积极引导所形成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对一些在发展道路上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正、调整,尽管有时这些平衡还很脆弱。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资本主义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主张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原英认为,这次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崩溃,今后将摸索实行政府部门在不抹杀市场前提下进行干预的“修正市场主义”,并向“修正市场主义”过渡。

## “不想做第一个”说明了什么

李允峰

兴业银行发布公告称,鉴于公司董事会认为年度报告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事项有待进一步论证,年度报告无法如期完成,申请4月28日披露2008年年报。其实,推迟披露2008年年报并非兴业银行一家,此前民生银行和浦发银行“预约披露年报时间”为今年2月27日和2月28日,但此后分别推迟至4月23日和4月10日。

这么多银行对高管薪酬问题躲躲藏藏,说明一是高管薪酬想必高过国家规定的280万;二是金融行业高管高薪现有的规定还存在猫腻猫的问题;三是在限制上市公司和其他企业高管的薪水问题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最好能够加强舆论监督结合起来,确保高管薪酬不成为空话、套话。

据媒体对14家国内上市银行2007年高管薪酬的统计,多名高管年薪超过280万。备受关注的格力电器高管因为股权激励,去年收入在4000万左右。看来上市公司确有办法通过一些手段把股权激励实现“曲径通幽”。高管薪水超高,自然“不想做第一个”,如果披露时间,关注的焦点就集中在你身上了,因此,大家

都不愿意冒这个险。而“不想做第一个”,从另外一个侧面提示我们,限售令是否存在弹性空间?想要彻底解决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收入过高问题,还需要尽量压缩这些弹性空间。当前上市公司和国有大型企业的高管人员,普遍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给自己决定薪水”的程序瑕疵,主导者和执行者都是企业高管,限制高管收入过高风险入一种如易行难行的困境。

还有,上市公司以及国有企业高管收入过高的制度规定的细化和具体化,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尽量细化工资的措辞,避免歧义,增强可操作性;另外一方面要明确国资负责部门的监督职责和范围,赋予相关主管部门以最大的独立性,从而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当然,舆论监督也非常重要,上市公司高管的收入应透明,并置于公共平台,接受民众和媒体的监督。说到底,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在国内经济面临发展减速之机,拥有大量财富的上市公司高管应该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压缩自身过量的利益获取,为稳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仅仅依靠推迟年报来躲猫猫是不行的。



漫画 刘道伟

## 韩国:企业不得设置年龄门槛

为解决韩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从3月22日起,韩国将开始执行禁止雇主在招聘中有直接或间接年龄歧视的法令。违者将面临最高3000万韩元(约合2.1万美元)的罚款。统计显示,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已从2000年的7%上升至2008年的10%。

## 用发展眼光看待券商经纪人问题



桂浩明

虽然中国的证券公司经历了持续一年多的熊市中介倒了,没有一家在熊市中倒下,与海外市场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证券行业“靠天吃饭”的状况依旧,大大小小的证券公司普遍还是缺乏真正可靠的盈利模式。同时,作为证券业务中相对最为稳定的经纪业务,竟受到了不小冲击。而其弊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券商经纪人缺乏规则约束而随意拉客户、诱导客户轻率投资有关。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总量增长较快,但是由于综合佣金率下降,很多券商实际盈利水平并没有随之出现相应提高,所谓“增产不增收”。另外,客户与经纪人之间的矛盾也有上升趋势。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利于证券行业的健康发展,客观上也不利于证券公司股票构成了负面影响。好在,易于其搞的《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正式推出了,以发展眼光看待券商经纪人问题,为推动经纪业务的规范发展,提升证券行业的竞争能力与盈利能力,提供了良好基础。

券商经纪业务,在本质上是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所需要的通道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衍生增值服务,而这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有足够的投资者群体作为服务对象。长期以来,证券公司普遍采取的是“坐商”模式,这在市场普及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早已难以为继,发展以“行商”模式为主的经纪人,主动出击抢夺客户资源,已成不少券

商控制经纪业务的重要选项。但因为过去缺乏这方面的规范,经纪人发展处于无序状态,以致对证券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市场上也一度有过要封杀券商经纪人的传闻。显然,从当前的市场实际以及实现券商低成本扩张的角度来看,券商经纪人是有存在必要的,但问题是规范。根据管理层现在所推出的规则来看,应该说基本解决了目前券商经纪人方面所存在的若干主要问题。譬如说,强调经纪人作为券商代理人的实际地位,要求持证上岗,并且只能接受一家证券公司的委托等等。这不但有利于维护券商的合法利益,也能够充分保证经纪人的实际利益,避免其承担与其身份、能力不相符合的过大业务压力,同时避免无休止地打佣金战,把工作重点放在提升增值服务上来,拒绝恶性竞争。

从证券行业的角度来看,新的券商经纪人规则的实施,能够使各个券商在经纪人业务上的竞争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同时也得以在规范的原则下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并且让经纪业务呈现出良好的工作秩序。再从券商的层面来说,也将使得其经纪人战略有了一个理性运行的支点,并且能够借助社提供衍生增值服务,避免其承担与其身份、能力不相符合的过大业务压力,同时避免无休止地打佣金战,把工作重点放在提升增值服务上来,拒绝恶性竞争。理由可以列出如下四点:

第一,美国是自由贸易规则的主要鼓吹者和制定者。自由贸易政策,是在与贸易保护主义反复较量中确立和被接受的,美国在其中发挥了实际的主导者角色。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表明,美国遵守WTO的自由贸易有了一定的理性运行的支点,并且能够借助社提供衍生增值服务,避免其承担与其身份、能力不相符合的过大业务压力,同时避免无休止地打佣金战,把工作重点放在提升增值服务上来,拒绝恶性竞争。理由可以列出如下四点:

## Column 专栏

即使个别政治家为了各种目的,提出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但是就整个决策层来说,美国不大可能把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国家决策。对我们来说,金融危机是个提醒,不管有没有贸易保护主义,把一个国家的经济过分建立在外部需求上,是比较被动的。把经济拉动力量建立在内需,尤其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上,经济增长才更可靠、稳妥。

## 奥巴马真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吗



王福重

当中国派出庞大采购团去“买欧洲货”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经济振兴方案中,却赫然写进了“买美国货”的条款,两厢形成鲜明对比。欧洲的领袖们和其他地方的人士,都严厉谴责奥巴马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不少人担心,美国为了尽快躲过金融危机,会全面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这种担心有道理,不过,这是一场虚惊,奥巴马不会掀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也不会真的搞贸易保护主义。理由可以列出如下四点:

第一,美国是自由贸易规则的主要鼓吹者和制定者。自由贸易政策,是在与贸易保护主义反复较量中确立和被接受的,美国在其中发挥了实际的主导者角色。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表明,美国遵守WTO的自由贸易有了一定的理性运行的支点,并且能够借助社提供衍生增值服务,避免其承担与其身份、能力不相符合的过大业务压力,同时避免无休止地打佣金战,把工作重点放在提升增值服务上来,拒绝恶性竞争。理由可以列出如下四点:

第二,美国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基于自由贸易的分工,美国放弃了从纺织品、机电产品到计算机制造等传统产业,而把资源投入到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些领域,美国才具有新的、更突出的比较优势。如果没有这种转移和新产业的开发,美国就不会一直领先世界。同样,美国也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如果美国身体力行,力推贸易保护,其他国家就会仿效,最受不了的还是美国。因为美国对世界的依赖程度,不但远远高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高于欧洲。美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太贵,如果美国生产电视,美国人是不是还能看得起电视,恐怕就是个问题了。

美国的老百姓,有一部分可能会支持贸易保护,如某些制造业的工人。但是,一旦真的要“美国制造”,就像那本畅销书《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会发现,离开中国制造,他们的日子没法过,最后还得回到自由贸易。美国人早已习惯了买中国货、日本货等外国货。

第三,美国的决策层,是由自由贸易者主导的。奥巴马政府的决策层,比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财长盖特纳等,受到的教育,都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主流经济学。即使个别

政治家为了各种目的,会提出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但是就整个决策层来说,似乎不大可能把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国家决策。比如金融业,是最具有美国特色的产业,也是美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之一。即便有金融危机,美国还得依赖这个庞大的产业。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金融业继续开放,外国资本继续自由进出美国。如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美国的金融业反而会危险。比如,美国人一直在动员中国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难道就不怕我们要挟它么?自由贸易就是建立在相信对方跟自己拥有同样智慧的基础之上的。

第四,所谓“买美国货”的条款,不过是为了安抚某些受金融危机冲击的行业的“政治秀”,是一种姿态而已。比如美国汽车业,面临巨大困难,处于破产边缘。为什么?除了金融危机,就是因为自由贸易,外国车进入美国没有任何障碍。可是,即使如此,我们甚至听到了克鲁格曼等人主张放弃汽车产业的声音,也没有听到限制进口外国车,鼓励美国车的政策。因为美国制造的汽车没有比较优势,放弃这个产业是迟早的事。

进一步地说,在全球化时代,根本没有纯粹的“国货”,比如芭比娃娃和波音飞

机,被以为是美国货,可是芭比娃娃在十几个国家合作生产,波音飞机,由几十个国家共同制造,都不完全是美国货。

所以,美国不会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最多不过是来点小儿科。一个小小的“买美国货”条款,就掀起轩然大波,也从反面说明,人们并不真的相信奥巴马真要推行贸易保护。要是换了其他国家,人们会有如此激烈反应么?其他国家类似条款也有,或者网罗做,没有写成条文,谁敢说说自己就那么干净。

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自由贸易,没有开放,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可是,金融危机是个提醒,不管有没有贸易保护主义,把一个国家的经济过分建立在外部需求上,至少是比较被动的。把经济的外拉动力量,建立在内需,尤其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上,经济的增长才更可靠、稳妥。

可是,为什么内需不振?因为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分配格局中,居民的收入份额过低。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是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健康成长的必须。

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必过分担心外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要把自己存在的问题,都归结为外国搞贸易保护。不管别人搞不搞贸易保护,我们的分配结构都要调整,只有富民,才能真正强国。(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